

全真教的创立与历史传承

张广保 著

国学论丛
陈鼓应 主编

中华书局

全真教的创立与历史传承

张广保 著

国学论丛
——陈鼓应 主编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真教的创立与历史传承/张广保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15.8

(国学论丛/陈鼓应主编)

ISBN 978-7-101-10776-0

I.全… II.张… III.全真道-道教史-研究-中国
IV.B95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39604号

-
- | | |
|-------|---|
| 书 名 | 全真教的创立与历史传承 |
| 著 者 | 张广保 |
| 丛 书 名 | 国学论丛 |
| 丛书主编 | 陈鼓应 |
| 责任编辑 | 朱立峰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5年8月北京第1版
201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640×960毫米 1/16
印张29¼ 插页2 字数410千字 |
| 印 数 | 1-2000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101-10776-0 |
| 定 价 | 78.00元 |
-

《国学论丛》序

当今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距离已被技术革新大大破除和缩短。东西方文化交流日趋频繁,虽然各国在军事、政治等方面界限重重,但从学术文化的角度来看,各种思潮之间彼此交汇融通,让世界舞台呈现出多样化的思想格局。透过历史文化的智慧结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才能够相互了解,欣赏彼此的独特性,并探讨其间的共通性。因此,在东西文明交相激荡的当下,在了解异质文化之余,继承与弘扬自己的文化传统已经显得尤为紧要。

我的师辈们大多学贯中西,具有良好的西学功底。但是,他们晚年却多选择在中华文明的土壤上建构其学术灯塔,留下的学术成果也多是对本国文化的深刻反思。在当代中国哲学家中,除冯友兰先生之外,金岳霖先生,虽最早将逻辑知识论介绍到中国来,但其形上学的体系架构却围绕“道”而展开,将蕴含中国文化象征性的“道”内化于生命,既追索理智的了解,又寻求情感的满足。又如,我的指导教授方东美先生,在我受业期间,主要讲授西方哲学,但他在晚年却选择经由汇通儒释道三家而构建起旁通统贯的思想体系。通过对他们学术历程的观照,我感受到庄子“万物殊理”,“道通为一”的精神,也深切地体会到弘扬与传播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价值。

最近十几年,我发觉两岸学界大量翻译和出版西方经典与前沿研究方面的成果,对有关本国文化的研究著作未能给予应有的关注。为此,我萌生了汇集海峡两岸文献功底深厚且别具创新观念的学者的稿件,来编辑一套名为《国学论丛》的丛书的构想。承蒙孔子学院总部“孔子新汉学计划”资助,这套丛书如愿出版,我对此深表感谢。我期

待,借由此套丛书的付梓,以探索民族文化艰苦历程中的延续性,找寻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生命力,整合并推动中国文化中坚力量的持续发展,使传统学术在多元世界中展开新的气象。

《丛书举国》

陳致應

2015年4月

目 录

导言(代序):中国全真教研究一百二十八年(1879—2007)	1
一、开创期	2
二、奠基期	4
三、复苏期	7
四、全面发展期	8
五、结论	14
第一章 祖庭与堂下——全真教各宗系的整合	16
第一节 金代的全真祖庭——灵虚观	17
一、祖庭之缘起	18
二、马丹阳对祖庭的经营	19
三、金代后期的终南祖庭	21
四、祖庭与金政府的关系	31
第二节 蒙古国时期的终南祖庭——重阳万寿宫	35
一、祖庭的兴复	35
二、祖庭会葬	37
三、祖庭宫观群的构成	39
四、祖庭与陕西地方政府	46
第三节 元代祖庭的兴盛	54
一、祖庭与阔端王府	54
二、祖庭与安西王府	57
三、元代祖庭的历任提点及其教风	62
第四节 元代全真教的东祖庭	71

一、东祖庭——大纯阳万寿宫	72
二、东祖庭之二——东华宫	77
第二章 蒙元时期全真教大宗师的传承	84
第一节 蒙古国时期的全真大宗师	86
一、宗师的起源	86
二、尹志平的即位与退位	88
三、李志常掌教及其与汗廷的交往(1238-1256)	98
四、张志敬掌教时期全真宗风的转变(1256-1270)	105
五、王志坦的短暂掌教(1270-1272)	109
第二节 宗派林立背景下的全真掌教宗师	111
一、佛道争难阴影下的全真宗师祁志诚(1272-1285)	113
二、复苏时期的掌教宗师张志仙(1285-1304?)	116
第三节 元代中期更迭频仍的全真掌教大宗师	119
一、两次出任掌教大宗师的苗道一(第一次掌教, 1308-1312)	119
二、仁宗时全真大宗师常志清(1312-1313)	120
三、来自祖庭一系的宗师孙德彧(1313-1320)	122
四、因罪致诛的掌教宗师蓝道元(1320?-1323)	124
五、来自郝太古一系的掌教宗师孙履道(1324-1328)	125
第四节 元后期刘长生、宋德方一门的独盛	126
一、苗道一的复出(1328-1335?)	126
二、最后一位全真掌教宗师完颜德明(1335?-1362?)	128
第三章 蒙元时期全真宗祖谱系的形成	131
第一节 四子与七真	131
一、四仙、四士	132
二、马丹阳在四子中的特殊地位	137
三、七真之形成	139
第二节 全真宗祖谱的演变	144
一、关于五祖	144
二、蒙元时期的三种全真祖谱	146

第四章 早期全真道戒律形成研究	156
第一节 早期全真道若干戒律系统的考察	156
一、关于王重阳开教时期的两种全真戒律文献	157
二、马丹阳的十劝	160
三、刘处玄的十劝、十二劝	163
四、丘处机、尹志平掌教时期全真戒律精神的转变	165
第二节 全真戒律的思想特色及其现代意义	170
一、心性修炼与全真戒律	170
二、早期全真教徒的戒律修持	172
三、关于全真道戒律精神之生态伦理价值的几点思考	174
第五章 金元全真教的修炼生活	176
第一节 乞讨与远游	177
一、乞讨	177
二、远游	182
第二节 坐环与战睡	187
一、坐环	187
二、战睡魔	192
第三节 打尘劳	195
第六章 全真道教性命双修的内丹学	201
第一节 全真内丹道与钟吕内丹道	202
第二节 全真内丹道的心性修炼	206
一、人体小天地——全真内丹学的基础思想	220
二、逆行原则	225
三、尚阳思想	227
四、攒簇之道——关于内丹学的时间问题	230
第七章 元代相容并包的道教管理政策	233
第一节 元廷与五大道派	233
一、元廷对五大道派的接纳	234
二、元代对道教分而治之的管理政策	238
第二节 大宗师与集贤院	241

一、全真宗师之被纳入蒙古政制	241
二、掌教宗师与集贤院	244
三、掌教宗师的职掌和品级	247
四、地方道官	255
第八章 全真教与蒙元皇室诸系的关涉	258
第一节 太宗窝阔台一系皇室、宗王与全真教	264
一、窝阔台与全真教	264
二、公元 1242-1250 年全真教与蒙古汗廷	273
第二节 拖雷系皇室成员与全真教	280
一、唆鲁忽帖塔尼、旭烈兀与全真教	281
二、蒙哥主政时举办的三次祈佑大醮	283
三、中统即位之前忽必烈与全真教的接触	288
四、世祖与长春宫祈佑大醮	291
五、忽必烈与佛道辩论	294
第九章 蒙元时期宗王、世侯对全真教的护持与崇奉	300
第一节 西道宗王与全真教	300
一、答剌麻八剌	300
二、晋王	301
三、永宁王昌童	301
四、荆王	303
第二节 东道宗王与全真教	305
一、势都儿大王	305
二、寿王	306
三、辽王	307
四、宁海王	308
五、驸马高唐王	310
第三节 全真教与汉地世侯	311
一、李全、杨妙真夫妇与全真教	314
二、严实与全真教	317
三、张柔与全真教	321

四、史天泽与全真教	323
五、其他诸侯与全真教	324
第十章 明代的国家宫观与国家祭典	328
序引 学术界对明代道教发展状况的评估及其误区	328
第一节 洪武年间(1368-1397)的朝天宫高道集团	331
一、关于朝天宫	331
二、朝天宫高道集团	334
第二节 主管国家祭祀的宫观——神乐观	344
第三节 永乐时期(1403-1423)创建的洪恩灵济宫、	
大德显灵宫	347
一、洪恩灵济宫	347
二、大德显灵宫	351
第四节 明代其他几座带有国家宫观性质的庙宇	353
一、北京东岳庙	353
二、城隍庙	354
结论	356
第十一章 明代初期(1368-1434)全真教南北宗风研究	358
序引 全真教内丹修炼与明代社会	358
一、大历史视野下的明王朝(1368-1644)	358
二、道教内丹修炼术对明代社会的渗透	359
第一节 明初北方全真教的清净修炼宗风	360
一、明初的陕西重阳万寿宫	362
二、明初北京白云观的坐钵修炼	374
第二节 南方全真教的内丹修炼及其对正一派的渗透	383
一、元末明初的江西全真教高道	383
二、龙虎山正一派与内丹修炼	387
三、苏杭地区全真教的清修风尚	392
结论	398
第十二章 明代全真教的宗系分化与派字谱的形成	399
第一节 关于学术界对全真教龙门派传法世系质疑的检讨 ...	400

一、陈教友的质疑与重建	400
二、小柳司气太田野工作中的发现	404
第二节 元代已有宗派之分化,但无派字诗	409
一、宗派的分化与宫观分布	409
二、仙人万寿宫——刘长生一系的繁衍	410
三、玉清万寿宫——丘处机一系在山东沂州的繁衍	412
四、元代全真教徒的命名通例	414
第三节 明代是派字诗形成的关键时期	416
一、元代的一些苗头	417
二、万历年间永乐纯阳宫的华山派	418
三、泰山三阳观的果老祖师云阳派	422
四、明代各地龙门派传承	424
附录 金元全真著述考	433
第一节 教祖王嘉及七真	433
一、教祖王嘉	433
二、马钰	435
三、谭处端	436
四、刘处玄	436
五、丘处机	437
六、王处一	438
七、郝大通	438
八、孙不二	439
第二节 全真第二代大弟子	439
第三节 全真第三代弟子	445
第四节 江南全真道	449
主要征引书目	452
后记	456

导言(代序):中国全真教研究

一百二十八年(1879-2007)

金代中期,王重阳在中国北方创立了一种有别于传统道教的新道教——全真教。全真教以三教合一为宗,以性命双修、功行并重为修炼门径,汲取禅宗的心性理论、修行方式等诸多因素,对传统道教从教义、戒律,到宫观组织、修行方式,以及终极超越境界等方面都进行全面革新,并在元以后分领道教的半壁江山,与正一教并立为二,最终形成北全真、南正一的道教宗派新格局。这就打破了此前道教史上灵宝、上清、正一等三足鼎立的旧格式。

在全真教的发展历史中,大蒙古国初期是教门发展的关键时期。它不仅确立了全真教在道教中牢不可破的重要地位,而且对整个中国社会、历史的走向也引发极为深远的震荡。开辟全真教这一发展新局面的关键人物就是全真掌教丘处机。正是丘处机以年逾古稀之龄万里西行,觐见“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及随之而来的雪山论道、一言止杀,使得全真教获得蒙古皇室的尊崇,从而走出道教,与当时的汉地世侯一道,担当起在蒙古国时期重建业已解体的中国社会,以及教化民众,化导杀心等重要社会、文化功能。从历史上看,道教在中国社会中的这种作用,在整个道教史中都不多见。因此,丘处机与成吉思汗的相遇,不仅是一个对道教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而且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事件。此外,考虑到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创立的蒙古帝国是一个地跨欧亚的大帝国。它的版图不仅包括北中国,而且还囊括俄罗斯(金帐汗国或术赤兀鲁思)、西亚地区(伊儿汗国或旭烈兀汗国)和中亚地区(察合台汗国)。其统辖范围几乎包括当时文明

世界半数以上的领土。又考虑到它与罗马教廷的复杂关系,我们说蒙古帝国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世界史。而丘处机与成吉思汗的相遇,乃是蒙古统治者首次郑重其事地对待一个定居农业文明的宗教领袖(虽然据《佛祖历代通载》卷三十三,在稍早几年,佛教与汗廷有过一次非正式的接触。),其对道教采取的接纳态度,无疑会直接影响此后汗廷的宗教政策,影响它对其他定居文明宗教,例如西亚的伊斯兰教、西藏的喇嘛教、中亚的聂斯脱里教(基督教在东方的一个宗派)等宗教的接纳。

一、开创期

对于全真教的研究,发展到今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已经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中国方面的研究如果从清光绪年间陈教友的《长春道教源流》算起,迄今已有一百二十八年的历史。总结这一百二十八年的研究历史,我想把它区分为四个阶段,即开创期、奠基期、复苏期与全面发展期。中国对于全真教的研究是由活跃于清代后期的陈铭珪开创的。陈铭珪(1823-1881),字友珊,入道之后改名教友,道号酖醪洞主。作为清代咸丰二年(1852)的副贡生,陈铭珪在仕途上一直不得志,加之晚清自道光之后,由于鸦片战争引发的政治、社会变革及西方文化学术涌入的冲击,晚年为了逃避社会矛盾,排解个人生命历程中所遭遇的挫折感,他在广东罗浮山酖醪观拜礼全真道士,正式加入全真龙门派成为一名全真道士。为了表达他对全真教的忠诚,陈铭珪于光绪五年(1879)编撰了后来成为全真教研究开山之作的《长春道教源流》。其书序云:“余中年感异兆,学道于罗浮酖醪观中。观为全真之龙门派,源出于邱长春。暇因考史册,并取《道藏》诸书核之,知长春之学,深有得于《道德》要言,而无炼养、服食、符篆、襁褓末流之弊……余因溯其源流,辑为是编,以告世之为全真学者。”^①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陈铭珪的道士身份直接影响到《长春道教源流》的撰述。此书共八卷,前七卷主要纂集自教祖王重阳、全真七子以降,直至清代的历代

^① 严一萍辑:《道教研究资料》第二辑,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年。

全真高道碑刻材料,间或以“酖醪洞主曰”的形式对史料进行考辨。第八卷名为“辨证”(十二则)及附录。由于撰写此书时,陈铭珪已正式遁入玄门,因此他编纂该书的意图很清楚,意在表彰前辈全真高道救世救民、慈心惠物、修道炼真的高尚行为。受此种动机的制约,他在择取史料时明显有偏颇,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对于历史上涉及对全真教批评的文献,诸如蒙古国时期耶律楚材所撰《西游录》、元释祥迈的《至元辨伪录》等,他就均未加入收录。此外书中搜集史料主要以丘处机一系的全真龙门派为主线,除卷一“全真教总论”收录有关教祖王重阳及六真的历史文献外,其他各卷多围绕丘处机及全真龙门派为主线,例如卷二、卷三题为“邱长春事迹汇纪”,卷四、卷五、卷六、卷七分别为“邱长春弟子纪略”、“邱长春再传以下弟子纪略”及“邱长春后全真法嗣纪略”,至于全真其他各派的传承法嗣则付之阙如。个中原因有二:其一邱门一系的全真龙门派在后世较其他各系更为繁盛,这在陈铭珪的家乡广东罗浮山尤其如此。其二与陈氏本人作为全真龙门派弟子的身份直接相关。他编辑此书的动机之一显然是要光扬本宗。至于题名“酖醪洞主曰”的辨证,也可以看出他处处刻意回护全真教。因此,该书虽然从前人文集中搜集大量有关全真教材料,因而为此后全真教研究奠定扎实的史料基础,但文中显露出的浓厚护教意识却妨碍其立论的客观性、公正性。

早在陈铭珪编著《长春道教源流》之前的清代道光、咸丰、同治(1821-1874)时期,清代学术的主流就已由考据之学向经世之学过渡,就中西北史地之学尤其为当时的学者所关注,李文田、丁谦、洪钧等都是这一领域的佼佼者。正是这些研究西北史地的学者出于对本学科的兴趣,重新发现淹没已久的元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并对之予以深入研究,当然重点在于发掘其地理价值。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有丁谦撰著的《元长春真人西游记地理考证》及王国维的《长春真人西游记注》(其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又有张星烺《西游记注释》),而钱大昕则有发端之功。(1866年的俄译本、1867年的法译本及1877年的英译本均是受此种中亚史、地理史研究语境的影响。)就中丁谦只

是将《长春真人西游记》看成一本单纯的地理学著述,毫不关注其宗教价值;^①而王国维则有所不同,在注文中除援引《元史》、《多桑蒙古史》、《蒙鞑备录》、《西使记》、《至元辨伪录》及元人文集等史料以疏释本文外,还花费相当笔墨考证书中涉及的蒙古时期全真教史,例如蒙古宪宗时的佛道争端,丘处机、耶律楚材的交恶。值得特别提到的是,王国维在书中附录中特别录引清考据大家钱大昕一段话,提示一起史实:丘长春以丁亥七月卒,而元太祖之殂,亦即在是经历过神奇性会面之后,又神秘地于同年同月逝世,此事在道教语境中的确引人遐思,其联想空间尤大。^②

二、奠基期

不过,从二十世纪有关全真教研究发展的历史看,陈铭珪《长春道教源流》一书无论在解释模式,还是在撰作体例方面对于后世尤其是二十世纪前五十年之前的全真教研究都具有很强的示范性。上世纪四十年代历史学家陈垣撰作《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显然就沿袭陈铭珪所创立的模式。对此陈垣本人也不否认。作为广东同乡,陈垣对自己的这位乡贤推崇备至。^③ 这从一方面说明缘于地域邻近性的影响有时是很大的。然而,陈垣与他的那位乡贤还是有很大不同:他并非全真道士。他之撰作此书显然不是出于宏道,而是直接受到当时特定政治、社会环境的激发。作者此书著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二次世界大战是当时制约时代的大事。其时作为同盟国一员的中国,大部分国土正处于作为轴心国主要成员之一的日本的占领之中。陈垣当时正生活在日占区中的北平。面对山河破碎、国土沦陷,他的心情极端忧郁,然而处于日占区,他又无法公开表达这种忧思,于是他将其寄寓于宋金之际兴起的全真教,意图通过对全真教在金蒙元史事的考证性诠释委

① 丁谦:《长春真人西游记地理考证》,严一萍辑:《道教研究资料》第二辑。

② 王国维:《长春真人西游记注》,严一萍辑:《道教研究资料》第二辑。

③ 他在书中提到,关于全真教的研究,历代均不重视,“六十年前,东莞宗人友珊先生撰《长春道教源流》,始稍稍阐明之”。这就充分肯定陈教友对于全真教研究的发端之功。《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华书局,1962年,第4页。

曲地表达自己的忧思。诚如作者撰于一九五七年的《重印后记》所言：“芦沟桥变起，河北各地相继沦陷，作者亦备受迫害，有感于宋金及宋元时事，觉此所谓道家者类皆抗节不仕之遗民，岂可以其为道教而忽之也。因发愤为著此书，阐明其隐。”^①正是缘于这一特定语境，陈垣关注的重点与他的那位乡贤有所不同。他突破陈铭珪单纯以龙门派为主线的宗派意识，以十二大专题为主线对金、蒙、元时期的全真教展开全面研究。与陈铭珪的研究相较，陈垣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表现下列特色：其一，取材更为广泛。除大量利用《正统道藏》内外文献之外，还广泛利用金石材料，这当然与其深厚的学识分不开。其二，由于国土沦陷的激发，“遗民”意识浓厚。他之所以用“南宋初”而不用金元来称呼新道教各派，显然是中国传统史家惯用之曲笔，其意乃在借史抒情。^②出于此种诠释意向，他极注重对全真创教之祖王重阳的考述。不过也正是这一浓厚的遗民意识，使他难以公正地刻画王重阳的历史形象。例如他认定王重阳为南宋遗民，因而就无法面对王重阳曾经应过伪齐武举、并在金朝任过监酒小吏这一历史事实。此外，王重阳的第一代大弟子大多与金皇室关系密切，例如七真中王处一、丘处机、刘处玄都曾先后接受金世宗、金章宗的召见。其实王重阳的出家、创教与其说是出于对宋室的忠诚，倒不如说是由于个人仕途的失意及由之引发的挫折感及对生命无常、虚幻等源于个体的生命领悟等个体因素。总之，陈垣依据自己解释语境对王重阳形象的塑造，只能是作者将自己遗民意识投射于历史人物。对此，我们不妨视为一种历史解释学的误读个案。其三，他以“新道教”来统称金末元初兴起的全真教、真大道、太一教等流行于北方的新道派，这是极富创意的。新道教与中国道教各派相比，确实具有独有的特色，例如公开宣称以三教

① 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第154页。

② 关于此点，他在书中有明确表述：“右三篇四卷廿三章，都七万余言，述全真、大道、太一三教在金元时事。系之南宋初，何也？曰三教祖皆生于北宋，而创教于宋南渡后，义不仕金，系之以宋，从其志也。靖康之乱，河北冀舍为墟，土流星散，残留者或竟为新朝利用，三教祖乃别树新义，聚徒群众，非力不食……然固汴宋遗民也，而宋遗民者多忽之，岂入元以后有遗民，入金以后非遗民耶，可谓大忘也矣。”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第3-4页。

合一为立教宗旨,所谓“三教搜来做一家”,并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道教尤其是北宋道教进行批评,这些都使当时教内外人士对其身份认同产生困惑。从当时文集所传材料看,当时人都觉得这些所谓新道教非释(禅)非儒亦非道,而教徒自己起初也不明确其教派归属,因而全真教起初可能完全是一种出于三教之外的新宗教。不过历史发展往往出人意料,全真教等新道教对传统道教的批判恰好构成道教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而为道教所包容。陈垣早在四十年代就使用“新道教”一词,说明他奠基于历史文献引发的感觉是敏锐的。其四,以八大专题对全真教展开全面研究对后来研究具有示范性,尤其是以“末流贵盛”为题对元代中后期全真教堕落现象的批评,难能可贵。^① 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对于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全真教研究有着很重要的影响,这可能与他在史学界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关。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界向有“南北二陈”之说,北陈即指陈垣。因此,《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堪称全真教研究的奠基之作。

值得提及的是,陈垣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提到的包括全真教在内的“新道教”在金元易代之际对于保全中华文化、维持种族延续重要作用的观点,在此后中国史学界引起颇为激烈的响应。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位重量级的中国史学家诸如钱穆、姚从吾都曾撰专论阐发陈垣的上述观点。钱穆在其所著《中国学术思想论丛》(六)之《金元统治下的新道教》、^②姚从吾撰作《成吉思汗信任丘处机这件事对于保全中原传统文化的贡献》、^③《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与救世思想》^④等都致力于扩展、阐发全真教在蒙古游牧文化大举入侵之特定历史阶段,对于延续中原汉文化、华夏种族生命之重要历史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学者当时或居留香港或自大陆迁居台湾,其时国共分争,国民党及其政府全线溃退,由大陆迁居台湾。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信奉马克思主义,对于传统文化采取一种偏向于全面否定的态度,这在

① 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之十一。

② 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8年,原文发表于1966年。

③ 载姚从吾:《姚从吾先生全集》第六集,台北正中书局,1982年。

④ 载姚从吾:《东北史论丛》,台北正中书局,1970年。